

社会理论与实践:老龄化与养老问题研究

编者按:老龄化已然成为进入 21 世纪中国社会政策制定的关键词和不可忽略的社会政策制定要素之一,并已经成为了当前学术界从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政策科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经济结构快速变迁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人口老龄化成为我国人口结构的主要特征,而与此相关的社会问题就是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在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结构微型化的共同作用下,家庭代际间传统互哺功能和传承功能呈现急剧弱化态势,家庭不再是唯一承担养老育幼的传统社会功能的结构主体。对于诸如职业类型是否影响居民的养老预期?职业类型和养老预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居民对养老方式的选择?老年人的居住模式,尤其是“空巢”的居住模式对于老年人的生存质量有什么影响?等等问题,当前学术界还缺少能够支撑科学养老政策制定的实证研究。为此,本刊组织了以下两篇文章,试图就此类问题激起学术界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的热情,更期待学术界能够实现从理论研究向实证研究的转向,在摸清中国老龄化实际与养老问题实情的基础上,关注中国老龄化社会问题,兼顾理论和实际,制定科学的适合中国实际的养老政策。

不同职业类型居民的养老预期及养老方式偏好

——基于吉林省的实证研究

蒲新微*

〔摘要〕 职业类型对养老方式的影响在已有的居民养老方式偏好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够重视,所以考察职业类型对养老方式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通过对吉林省不同职业类型居民的养老预期和养老方式偏好实证调查的数据分析以及引入养老预期作为中间变量的定性研究,我们发现:职业的稳定性 and 声望地位均影响居民的养老预期和养老方式偏好;职业稳定性越高,社会声望地位越高,从业者应对风险的能力就越强,养老正预期也就越高,因而更倾向于通过自己和商业机构养老。相反,职业不稳定和声望地位较低的人,养老的负预期就越明显,从而对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公办养老机构的依赖程度就越大。

〔关键词〕 职业类型;养老预期;养老方式;社会政策

* 社会学博士,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130012。本文是吉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15A1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3M540257)的研究成果。

一、引言

老年生活是人生历程的必经阶段,保障老有所养对个人与社会意义重大。然而,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加剧,获取优质老年生活的难题逐渐显现于世界各国面前。养老的必然性、困难性以及重要性,促使学者将越来越多的精力和焦点投放在老年生活问题的研究上。中国也不例外。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预期寿命延长、未富先老等特殊国情使我国养老问题日益突出。据统计,2013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2 亿人,^①2050 年中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 4.12 亿、占总人口比重的 27.4%;^②全国老龄办公布的报告显示:2001—2020 年,我国老年人口平均增长速度将达到 3.28%,大大超过总人口 0.66% 的增速;^③19 世纪 50 年代初期,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水平落后于北欧国家 30 年,但到 2005—2010 年,这种差距骤减到了 5.5 年,^④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从建国初的 44.6 岁提高到 2013 年的 74.4 岁。特别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红利优势的渐逝,又进一步加剧了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重程度,增加了我国应对养老问题的难度,也增加了人们对未来养老处境的担忧,种种叠加效应的后果是导致越来越多的年轻群体开始关注养老问题。所以,当《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调查青年群体的养老预期和职业选择时,84.5% 的受访者坦言养老预期与职业选择关系密切,人们都希望进入稳定的机关事业单位,不仅在职时待遇高,而且退休后养老金替代率也高。^⑤那么,到底职业类型是否影响居民的养老预期?职业类型和养老预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居民对养老方式的选择?由此,本文从职业划分的角度,立足于 2014 年吉林省关于“居民的养老预期及养老方式偏好调查”数据,建立以职业类型为自变量,以养老方式偏好为因变量,同时引入养老预期作为中间变量的分析模型,深入研究身处不同职业类型的居民对自身未来养老状况和养老方式的预期和期望,这不仅能够为持续推行可行的养老方式提供科学依据,而且对于解决老龄化高峰期盲目养老、忧虑养老等问题提供具有前瞻性和现实性的参考价值。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国外对于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集中于选择原则角度的研究。Petri Beckerman 认为选择何种方式关键问题是要看在怎样养老能让其获得主观幸福感,他以生命质量理论为前提,以保持健康状况和收入水平为依据提出如果在家里生活很脆弱,那就可以选择进入机构养老;如果在机构中感觉生活质量下降,那么就可以选择家庭养老。^⑥而 Martina Boström 等

①李培林、陈光金、张翼:《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8 页。

②杨乔:《养老意愿及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调查研究》,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山西医科大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2014 年,第 1 页。

③熊波、林丛:《农村居民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武汉市江夏区的实证研究》,《西北人口》2009 年第 3 期。

④[丹麦]约尔根·格尔·安德森:《应对人口变动的挑战:从欧洲视角观察北欧国家的老龄化和养老金体系》,徐杨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64 页。

⑤中国青年报, http://zqb.cyol.com/html/2013-03/15/nw.D110000zgqnb_20130315_3-T04.htm。

⑥P. Bockerman & E. Jonhansson,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for old-age individuals: Is life really miserable in care homes?”, *Ageing and Society*, vol. 32, 2011, pp. 1176—1192.

瑞典学者则认为无论推行哪种养老方式,其目的都是要促进老年人自身具有安全感,实现整个生命跨度的健康老龄化过程,不管在私人住宅还是养老院中,都要致力于为其建立一个安全的生活网,提高他们的控制感并让其在自我意识上体会到健康和安全,这是很重要的。^① Adam Davey 等人认为为老年人提供一个公平和平等的养老环境和养老服务才是更重要的。^② 二是集中在责任主体方面的研究。在研究居家养老方式时,Hille 强调政府作为社会资源的最高统筹机构,应该提供更多方面的支持,^③尤其是要让联邦政府加大财政支持。在研究机构养老方面,Nyman 强调机构的责任主体地位,他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和身体状况下降,老年人对机构养老服务需求增加,但由于机构养老收费昂贵,影响了养老机构的入住率;^④在研究社区养老方面,社区必须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承担起老年照护的职责,所以,社区管理人员应努力去挖掘、利用社区的资源。

相对而言,国内对养老方式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从户籍制度的影响方面,大部分研究都认为家庭甚至居家养老才是人们预期的养老方式。这种选择意愿在农村尤为严重,农村由于养老观念等因素导致依靠家庭养老依然是农村老人养老的主要方式,并且也是农村老人期望养老方式的一个主要选择方向;^⑤即使是人口在流动也没有影响他们的养老意愿,因为人口流动仅仅“冲击着”家庭养老实现的可能性,但并没有改变家庭养老的责任和整体功能。而在城市,人们也倾向于选择社区和家庭相结合的居家养老方式,^⑥因为城市居民对养老院养老的认可度不高。二是人们的养老意愿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各类人群养老意愿的偏好及其影响因素上。当前我国家庭养老仍是老年人养老方式的主要选择,机构养老需求有所增加,社区居家养老有待规范,^⑦老年人的养老意愿正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对养老服务的社会化需求在不断增加,许多老年人对新兴的养老方式表现出了新的需求。从宏观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政策导向和人口因素都对居民养老方式产生影响;^⑧从微观上,性别、收入、年龄、家庭规模及子女数量等也对养老方式的选择有影响,^⑨但随着认识观念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子女属性逐渐不对其父母的养老方式选择产生显著影响。三是从家庭结构的角度,家庭结构的变迁增加家庭养老的负担,多元化养老方式的意愿成为趋势;^⑩通常有子女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方式要高于无子女的老年人,并且随着子女数量的提高居家养老的倾向也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家庭男孩数与对家庭养老方式呈正相关,女孩数影响不显著,子女的孝顺与否对居民养老意愿的影响十分显著;^⑪但也有研究认为在独生子女的家庭中,父母受子女属性的影响不显著,代替的是配偶因素在养老决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⑫

上述研究为探讨合理的养老方式奠定了基础,但是综观这些研究,鲜有从职业类型的角度直接探讨养老方式的文章。那么,不同的职业类型是否对养老预期以及养老方式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呢?

①M. Boström & M. E. Bravell, “Promoting sense of security in old-age care”, *Health*, vol. 5, 2013, pp. 56—63.

②A. Davey & L. Johansson, “Unequal but equitable: An analysis of variations in old-age care in Sweden”, *European Journal of Ageing*, vol. 3, 2006, pp. 34—40.

③H. Schmid, “The Israeli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law: Selected issues in providing home care services to the frail elderly”, *Health and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 vol. 13, 2004, pp. 191—192.

④S. Redfem, “Work satisfaction, stress, quality of care and morale of older people in nursing home”, *Health and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 vol. 10, 2002, pp. 512—517.

⑤林琳、刘毅:《四川农村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成都医学院学报》2013年第12期。

⑥李敏:《社区居家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⑦杨敏、钱英:《城市社区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护理研究》2012年第1期。

⑧胡明玉:《赡养协议制度——对一种新型农村养老模式的分析》,《行政与法》2013年第4期。

⑨熊波、林丛:《农村居民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西北人口》2009年第5期。

⑩张正军、罗楠:《家庭结构变动下城市的养老模式选择研究》,中国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社会保障专业,2012年。

⑪陶涛、丛聪:《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人口与经济》2014年第5期。

⑫洪娜:《上海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方式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南方人口》2013年第12期;王萍、陈颖:《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风险探析——以南京市为例》,《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本文力图以社会风险和身份认同为理论背景对此进行分析。

（一）职业类型与养老预期

社会风险理论提出,风险是当代社会最普遍的现象之一,不确定性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社会风险影响社会的稳定,风险越大,后果越严重,职业风险是社会风险中的一部分,它是在执业过程中具有一定发生频率并由该职业者承受的风险,包括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和人身风险等。不同的职业面临不同的社会风险,比如教师和农民工比较,教师可能面临更多的精神压力,农民工面临更多的身体损伤风险;不同职业应对风险的能力不同,面临的风险越大,应对风险的能力越弱,人们对未来的担忧越多,对未来有良好的预期可能性越低。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一:工作稳定性越高,抗风险的能力越强,养老正预期就越高;反之,工作越不稳定,抗风险的能力越差,养老预期越不乐观。

（二）职业类型与养老模式选择

身份认同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认知,是个人对所属群体角色及特征的认可程度和接纳态度,职业身份认同作为其中的一种,是个人作为职业中的成员的自我定义,它和职业角色的制定有关。对职业的认同情况,影响着个人对不同职业的情感态度,进而影响人们的职业选择和职业诉求。不同的从业者会有不同的社会地位,从而有着与社会地位相匹配的资源。这种资源一方面影响各种职业的社会声望,另一方面也影响着人们在职时对老年资产的积累,影响着退休时人们的养老待遇,所以职业可能对居民老年生活的预期和方式的选择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二:身份地位越高,自我保护能力越强,养老的独立意识就越强,对政府、社会、子女的依赖就越小;反之,身份地位越低,自我保护能力越弱,对政府、社会、子女的依赖就越大。

（三）养老预期与养老方式偏好

预期理论认为人们都会在对现有状况进行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去预测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而决定自己的行为选择倾向。所以,养老预期作为人们对自身老年时期的生活状况所作出的预计和期望,不仅会影响人们当下的参保意愿和参保积极性,而且对人们所期待和偏好的养老方式也会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积极乐观的人可能会更倾向于依靠自己和子女,而消极悲观的人可能会倾向于希望政府和社会为其解决养老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三:养老正预期越高,养老压力就越小,人们越倾向于依靠自己、子女和商业养老机构;而养老负预期越高,养老压力就越大,人们就越希望政府和社会更多地承担助其养老的责任。

三、抽样、变量及测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本课题组2014年9月至11月期间对吉林省三个城市的8个区进行的实地调查。样本选取方面,第一步是城市的选取,为了尽可能增加样本的代表性,在层次上分别为省会城市(长春)、地级市(吉林)和县级市(敦化),然后在每个城市选取两个区;第二步是调查对象的选取,为了兼顾到各种职业类型以及18周岁以上的各个年龄段群体,本次调查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抽取样本的基础上,部分采用集中发放,部分采用面对面直接填答的方式,共计发放8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737份,问卷有效率为92.1%。本文所使用的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

表 1 样本情况描述及统计结果 (N = 737)

变量	频次	百分比 (%)	变量	频次	百分比 (%)
性别: 男(=1) 女(=2)	353 384	47.9 52.1	职业类型: 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人员(=1) 专业技术人员(=2) 办事人员(=3) 商业服务业人员(=4) 农业劳动者(=5) 产业工人(=6) 军人(=7) 不便分类的其他人员(=8) 无业人员(=9) 待业及在读大学生(=10) 进城务工人员(=11)	252 67 59 25 22 27 17 9 22 156 26	34.2 9.1 8.0 3.4 3.0 3.7 2.3 1.2 3.0 21.2 3.5
年龄: 青年(=1) 中年(=2) 老年(=3)	432 261 44	58.6 35.4 6.0			
户籍: 城市(=1) 农村(=2)	543 194	73.7 26.3			
养老预期: 不容乐观(=1) 没想过(=2) 应该不错(=3) 非常乐观(=4)	154 106 295 182	20.9 14.4 40.0 24.7	养老方式: 政府 & 社会(=1) 自己 & 机构(=2) 子女 & 亲朋(=3)	374 564 258	50.7 76.5 35.0

注:养老方式是多选题,所以频次之和大于样本总数,百分比之和也大于百分百。

(二) 变量设计

1. 因变量:养老方式的选择。对养老方式的研究尽管积案盈书,但是却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和划分,常用的方法是以生活地点以及获取养老供给和服务的渠道和方式为依据,将其划分为家庭养老、机构养老以及政府养老。随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养老方式的外延不断扩大,出现社会化养老、居家养老等概念,但每一种界定都需要完善,由此,本文依然采用以资金来源和照顾方式为依托,探讨人们所期待或预测的养老方式。即独立意识和自我保障能力较强的养老方式是依靠自己和商业养老机构(编码为2),而依赖性和自我保障能力较弱的养老方式是依靠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公办机构养老(编码为1),其他则是倾向于子女和亲人(编码为3)。

2. 自变量:职业类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①本文将职业划分为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管理人(编码为1),专业技术人员(编码为2),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编码为3),商业服务业人员(编码为4),农业劳动者(编码为5),产业工人(编码为6),军人(编码为7),不变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编码为8),无业人员(编码为9),在读学生及待业毕业生(编码为10),进城务工人员(编码为11)。

3. 中间变量:养老预期。养老预期作为自身对未来养老的预期和期望,必然表现出某种积极或消极的心态,本文将对自身养老持乐观态度的界定为正预期,包括非常乐观和应该不错(编码为4和3),将对自身养老持消极心态的界定为负预期(编码为1),而对此根本没有考虑过的界定为零预期(编码为2)。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将我国职业划分为八类,第一大类: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第二大类:专业技术人员;第三大类: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第四大类:商业、服务业人员;第五大类: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第六大类: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第七大类:军人;第八大类: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四、统计结果及分析

（一）职业类型与养老预期

本文主要以工作稳定性和社会声望地位为切入点进行分析,其中,工作稳定性以失业率的大小、在职和退休后获得收入的稳定情况为指标。迈克尔·谢诺登指出,良好的社会政策和工作状态可能让人们更自信、家庭更团结、社会关系更紧密、人们更积极地参与民事活动,充实的资产积累有助于产生更稳定、更具有责任感的公民。^① 工作的稳定性不仅影响居民的工作压力和幸福感,更影响其为老年生活进行资产积累的能力以及老年生活待遇的获得。所以,工作的稳定性深刻影响着人们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成为影响择业者择业的重要因素。

表 2 不同职业居民的养老预期状况 (N = 737)

养老预期状况	非常乐观		应该不错		没想过		很不乐观		
人数 & 频数	数	率	数	率	数	率	数	率	总计
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管理人	88	28.7	132	43.0	30	9.8	57	18.7	307
专业技术人员	16	23.9	29	43.3	8	11.9	14	20.9	67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7	11.9	22	37.3	15	25.4	15	25.4	59
商业服务业人员	3	12	8	32	3	12	11	44	25
农业劳动者	5	22.7	4	18.2	2	9.1	11	50	22
产业工人	11	40.7	5	18.5	2	7.4	9	33.3	27
军人	6	35.3	7	41.2	2	11.8	2	11.8	17
不变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2	22.2	4	44.4	2	22.2	1	11.1	9
无业人员	2	9.1	3	13.6	5	22.7	12	54.5	22
在读学生及待业毕业生	37	23.7	71	45.5	35	22.4	13	8.3	156
进城务工人员	5	19.2	10	38.5	2	7.7	9	34.6	26

注:(1)这里的频数仅是群内比例,例如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管理人中表示非常乐观的人数占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管理人的 21.3%;(2)表中的“数”代表频数,“率”代表频率。

从表 2 中可以直观地看到,不同的从业者对养老预期有着不同的偏好。其中,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和企业管理人组别、军人组别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组别拥有显著的正向养老预期,即对老年生活持“非常乐观”和“应该不错”态度的人数比例很高,分别达到了 71.7%、76.5% 和 67.2%。通过个案访谈得知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这些从业者工作很稳定,生活压力较小,幸福指数高,更容易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而这种乐观的心态使他们对待事物当然也包括养老预期,有更乐观的态度;其二,这些职业的从业者工作稳定,失业风险小,从业者稳定的工作收入还能充分地进行资产积累。三是这些职业能够从制度层面获得较高且稳定的保障,对养老、医疗等方面没有后顾之忧。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有很强的专业技能,失业的风险较低;军人有很强的吃苦耐劳和不畏困难的精神,主观上进一步降低了他们对养老风险的担忧度。以上种种原因降低了三类组别工作人员的养老风险,增强了他们对抗风险的能力,不需要为老年生活担忧,养老预期自然很乐观。

对于在读学生以及待业毕业生,他们中 69.2% 的人拥有正向养老预期。这组人员持有较乐观养老预期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观上,由于经验及阅历有限,这组人员不能正确评价自己的能力,经常过高估计自己,设想自己会得到有充分保障的工作。第二,客观上,他们的人力资本相对

①[美]迈克尔·谢诺登著:《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334—337 页。

较高,且随着学历的增高,就业率增大,所从事的工作趋向更稳定、待遇更高。第三,大多数在读学生以及待业毕业生,都是少子化的一代,能够从长辈那里获得更多的资源。以上三点,都降低了在读学生以及待业毕业生的社会风险,增强了他们战胜风险的能力,因此,他们的养老预期比较乐观。

表2显示,无业人员在所有的调查人员中,对养老预期持负向态度的比例最高,达到78.2%。这也可以从社会风险的角度来看。无业者没有收入,当期生活风险就很大,更没有办法为老年生活积累资源,而且没有工作也就意味着没有退休后的养老待遇。此外,很多无业者,其能力相对不足,进行人力资本再投资的几率小,再就业困难,长此以往,就会更深地陷入贫困的牢笼,造成贫困的恶性循环。这些原因既加大了无业者的养老风险,又削弱了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所以他们十分担心老年生活也在情理之中。表2中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的负向养老预期即“很不乐观”的人数也较多,占被调查商业、服务业人员总数的44%。他们和无业者一样,因工作待遇差、工资变动大、失业几率高,难为养老进行有效的资产积累,难有良好的退休待遇,所以对未来的担忧高,养老预期较差。

比较特殊的是农业劳动者和进城务工人员。两组从业者的工作稳定性较差,但他们的养老预期并没有随之很差。针对这种现象,笔者认为,近些年国家对农业劳动者和进城务工人员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各种相关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提高了他们的待遇,当期养老待遇的水平和稳定性得到提高。而且两组从业者也都可以选择回到农村生活,生存成本降低。这减小了他们的风险,增强了他们应对风险的自保能力。其中的农业虽然是“靠天吃饭”,但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产品增速的提高、各种补贴和免税政策的扶持、各种灾害的危害程度的降低,导致从事农业劳动的风险下降。所以,尽管工作稳定性较差,但是仍有40.9%的农业劳动者和57.7%的城务工人员有良好的养老预期。

总体来说,有较高正向养老预期的居民相对来说都是身处稳定职业类型中的人员,他们既有当期稳定的收入来积累养老资产,又有可依赖的制度和政策来保证稳定的退休待遇。而有较高负向养老预期的职业,其职业特点正好与上述职业的特点相反如无业人员。所以本文假设一所认为的,职业的稳定性影响养老预期,从业者从事工作的稳定性越高,养老风险越小,其养老正预期越高的说法得到验证。

（二）职业类型与养老方式偏好

李春玲、刘爱玉等学者研究证实了当前的职业排位深受职业权利、工作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职业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评价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证实了不同职业拥有不同的身份地位,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声望,^①由此,本文将身份地位不同的职业进行了划分:社会声望地位最高一类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及军人,第二类为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第三类为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进城务工人员,最后为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和无业人员,在读学生及待业毕业生另外考虑。^②

根据表3数据模型的统计结果,针对养老方式偏好而言,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管理人员以及军人对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公办养老机构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性,即相对于进城务工人员而言,稳定性强和声望地位高的职业都不倾向于进入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养老机构中,而相对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而言,进城务工人员和无业人员则更希望政府和社会为其提供更多的养老资源。这一方面说明机关事业单位和军人都因为较高的声望地位和丰厚的待遇而有相对充足的养老储备,对养老方面的后顾

^①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②笔者将作者研究的职业归类到本文的十一个大类职业当中,并将各大类职业中具体职位的得分加总,求出各大类职业的平均数,结果为: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管理人(73.45),专业技术人员(53.69),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64.49),商业服务业人员(46.47),农业劳动者(31.82),产业工人37.74),军人(62.53),进城务工人员(28.22)。按等差数据分为四组,组距为20,最大值为80,最小值为20。所以得出本文所分职业的社会声望等级。

之忧较小,另一方面表明我国公办的养老机构条件较差,其定位是在人们权利义务不对等的前提下只能保障人们基本的生存需求,所以,它只能成为无业者和流动人口的最后依托。表中比较特殊的是农业劳动者,他们职业的社会声望较低,但是却与期待政府和社会养老成负向相关关系,对其期望不大。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政府和社会一直以城市居民养老保障的建设为重点,较为忽视农村地区养老事业的发展,导致农村敬老院环境较差,农民靠政府和社会养老的信心不足;另一方面缘于农村地区思想相对落后,传统“养儿防老”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这弱化了对社会和政府养老方式的选择。

表 3 不同职业居民的养老方式(N=737)

变量	政府 & 社会	自己 & 商业	子女 & 亲朋
一类(进城务工人员为参照)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和企业管理人	-0.463*(0.419)	-0.075(0.484)	0.550(0.481)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0.022(0.483)	-0.381(0.545)	0.300(0.547)
军人	-0.352*(0.631)	0.336(0.788)	0.329(0.707)
二类(进城务工人员为参照)			
商业服务业人员	-0.711(0.570)	-0.629(0.625)	-0.454*(0.717)
专业技术人员	-0.801(0.473)	0.536(0.578)	0.811(0.528)
在读学生及待业毕业生	-0.521(0.434)	0.897** (0.532)	0.652(0.494)
三类(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管理人员为参照)			
农业劳动者	-0.189*(0.443)	-1.497** (0.454)	1.022*(0.450)
产业工人	0.368(0.408)	-1.504** (0.414)	0.728(0.404)
进城务工人员	0.463(0.419)	0.075(0.484)	-0.550(0.481)
无业人员	0.176*(0.443)	0.095(0.526)	-0.569(0.523)
不变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0.687(0.716)	0.950(1.069)	0.877(0.682)
-2LL	1012.759	750.602	934.204
Pseudo R ²	0.012	0.069	0.027

注：* $p < 0.05$ ；** $p < 0.01$ 。括号内为标准误。

对于自己和商业机构的养老偏好而言,在读学生及待业毕业生、农业劳动者、产业工人三种职业对自己和商业机构养老方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在读学生及待业毕业生更倾向于依靠自己养老和将来进入商业养老机构,他们对自己和机构养老的期望是进城务工人员的2.453倍($e^{1.121}$, $p < 0.01$);农业劳动者和产业工人不期望自己和机构养老的趋势明显,与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管理人相比,分别是其0.224和0.222倍($e^{-1.121}$, $p < 0.01$)。由此可见,除农业劳动者外,表中的数据大致符合了社会声望地位越高,养老独立意识越强,对政府和社会依赖越小的假设。

对于依靠子女和亲朋提供赡养支持而言,只有两类职业群体表现出显著相关性,一类是商业服务业人员,他们与子女亲朋养老方式的预期呈显著负相关,这类职业虽然不稳定,生活风险较大,但是他们仍然表示不想增加子女的负担。而农业劳动者与子女赡养呈显著正相关,期待程度是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管理人员的2.779倍($e^{1.121}$, $p < 0.01$)。这一方面是因为农村家庭受计划生育影响较小,很多家庭仍是多子女家庭,他们具备依靠子女养老的资本,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乡土气息仍比较浓重,人与人之间的互帮互助气氛依旧明显。所以,社会声望地位越高,自我保护能力越强,养老的独立意识越强,对政府、社会、子女的依赖越小;反之,社会声望地位越低,自我保护能力越弱,对政府、社会、子女的依赖越大的部分结论得到验证。

(三) 养老预期与养老方式偏好

人的选择与行为总是受到心理预期的驱使,不同的心理预期促使人们做出不同的行为选择。养老预期是社会成员基于自身所处的环境以及对养老事实的认知而产生的对养老意愿的一种表达,受

这种预期和意愿的驱使,人们在选择养老方式时往往会带有一定的主观倾向性。

表 4 不同养老预期下养老方式的选择 (N = 737)

	社会 & 政府的公办机构		自己 & 商业养老机构		子女 & 亲朋	
	B	EXP(B)	B	EXP(B)	B	EXP(B)
非常乐观	-0.252(0.245)	0.777	0.01(0.281)	1.010	0.248(0.264)	1.281
应该不错	-0.69(0.227)	0.934	0.468** (0.27)	1.597	0.478* (0.244)	1.613
不容乐观	0.212(0.254)	1.236	-0.281* (0.283)	0.755	0.03(0.277)	1.03
常数	0.076(0.194)	1.078	1.074(0.223)	2.926	-0.884(0.214)	0.413
-2LL	1016.98		3791.938		947.794	
Pseudo R ²	0.008		0.015		0.009	

注：* $p < 0.05$ ；** $p < 0.01$ ；括号内为标准误；以“没想过”的零养老预期为参照。

从表 4 的数据中看到，“非常乐观”这种养老预期对养老方式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而预计自己老年时期的生活“应该不错”的居民，对自己和机构、子女和亲朋养老方式的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两种养老方式偏好是“没想过”预期倾向的 1.597 倍和 1.613 倍 ($e^{1.121}$, $p < 0.01$)，其原因在于凡是较乐观的人，除了本身是乐天派之外，基本上应该都是生活无忧、养老风险小，抵抗风险能力强群体，他们更加注重情感需求，所以不依赖于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公办机构养老，而倾向于自己和机构、子女和亲朋的养老方式。对养老“不容乐观”的居民明显呈现出对自我养老和进入商业养老机构的排斥，很显然，这类群体对自我养老力不从心，对商业机构养老渴望而不可及，所以，他们与自己和机构养老方式的选择呈显著的负相关，只占“没想过”预期比例的 0.223 ($e^{-1.121}$, $p < 0.01$)，也就是无能为力选择自我养老和进入商业的养老机构。所以，假设三中提出的“养老正预期越高，人们越倾向于依靠自己、子女和商业养老机构；而养老负预期越高，人们就越希望政府和社会更多地承担助其养老的责任”基本得到验证。

五、结论及建议

职业类型影响居民的养老预期和对养老方式的选择，养老预期也对养老方式产生作用。研究发现：(1) 职业的稳定性影响着居民的养老预期，职业的稳定性越高，养老正预期越强；(2) 职业的社会声望地位影响人们对养老方式的选择，社会声望地位越高，对依靠社会和政府公办养老机构的选择倾向越低，对自己和商业机构养老方式选择的倾向越高；(3) 养老预期与养老方式偏好关系密切，养老正预期高的人倾向于依靠自己与商业机构养老，而养老正预期低的人，更倾向于进入政府和社会公办的养老院。

既然职业的稳定性越高，从业者的养老风险越低，养老的正预期也越高，那么，国家可以合理的对各行业的工资待遇、保障制度、辞退行为和福利状况进行干预，以缩小职业之间的待遇差异，让养老资源这种公共物品在各个行业之间进行公平配置，使各种职业类型的居民都能获得相对平等的养老待遇，以提高人们应对养老风险的能力、减小其对老年生活的担忧。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养老保障覆盖面和维护社会稳定，而且有助于实现代际和谐，让年轻人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促进社会发展。对于持乐观养老心态的农业劳动者和进城务工人员而言，他们既得益于“三农建设”在税收和补贴方面带来的实惠，又受惠于城市化和新兴城镇化过程中对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所以，他们养老正预期比较好，这意味着现行政策已经起到了惠民利民的作用，应该持续推行下去。

从养老方式角度来看，从事的职业稳定性越强、声望地位越高，就拥有更多的资源，养老风险就

越低,所以,独立养老的意识就越强;相反,从事的职业不稳定、社会地位较低、社会资源匮乏的人就很难有从容应对老化的信心,只能依靠政府和社会。这就要求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一是要规范各行业各部门的福利待遇,防止待遇差距过大导致人们的失衡心理和非理性行为;二是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要合理,无论何种职业中退出工作,人们的养老需求是同质的,不能让退岗后的养老供给出现过大差距,这需要推进统筹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域之间的养老保障制度来实现;三是国家可以在一定补偿政策下,加强对独立意识的宣传,加强教育事业,提升个人的独立性,减轻国家的负担;四是政府既要投入资金保障弱势群体的养老需求,又要监管基层管理部门从“管”到“治”的改革,更要加强基层养老院的建设。同时,由于大部分居民都对子女养老持有偏好,所以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居家养老方式都是必行之路。但要在不给予子女加压的前提下实现对老年人的“善”养,有必要加强居家养老模式建设,既要强化社区在养老方面的功能,又要加强养老服务队伍建设。

当然,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要向着更加公平可持续性迈进这一战略部署后,国务院迅速出台了《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并正式公布了《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这对解决不同群体之间养老资源和养老供给的代内公平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希望该举措能够有效缩小不同职业群体之间养老预期的差异,缓和不同养老资源居民之间的矛盾。

(责任编辑:杨嵘均)

Old-age Care Expectations and Preferences of Residents of Different Occupa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in Jilin Province

PU Xin-wei

Abstract: The effect of types of occupations on old-age care modes has no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 among the existing studies on residents' preferences for old-age care modes. Hence, investigating such effec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rough analyzing the data from an empirical study on old-age care expectations and preferences of residents of different occupations in Jilin province, we conducted a qualitative study taking old-age care expectations as the intermediate variab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occupational stability, prestige and status exert influence on residents' old-age care expectations and preferences. People taking stable occupations with high prestige and social status display stronger ability to respond to risks. They have higher positive old-age care expectations, thus tending to depend on themselves and private institutions for old-age care. By contrast, people of unstable occupations with low prestige and social status show an obvious inclination for negative old-age care expectations. Therefore, they rely more on public old-age care facilities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Key words: types of occupations; old-age care expectations; old-age care modes; social policies